

本地生提供獎學金、放寬工作限制、加強宿舍建設；與內地院校合作辦學，確立兩地互認學位機制；向海外及內地推廣香港教育服務等。

他繼續說，從“區域教育樞紐”到“國際教育樞紐”，政策輻射範圍由亞洲範圍內擴大至全球，政策思路卻沒有太大改變。以“放寬入境及學額限制”為例，2004年港府規定專上院校非本地生佔本地生為10%，到2008年擴大至20%；15年後的今天，政府計劃把有關比例倍增至40%。

然而，從非本地生生源來看，不太能夠見到以前的“區域”教育樞紐和如今的“國際”教育樞紐有何區別。他強調，香港國際化優勢，例如英文授課、地理位置優越等。根據統計處去年6月發布的《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統計數字》顯示，教資會資助的八大課程中，內地生佔非本地生的74.8%，亞洲其他地區佔21.6%，其他的僅有3.7%。

鄧飛更指出，留學中國香港這個品牌，從來不是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印象，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國際教育年報的國際知名留學國家和地區，從來沒有香港。這些討論令人疑惑，既然非本地生生源單一化，亦未能形成國際留學品牌，那麼，光靠我們所建議的統籌、舉辦大型海外教育論壇、到海外宣傳招生之類的老辦法，如何實現塑造外來學生，提升香港軟實力和話語權的美好願景？所以建議必須要政府去做，香港教育資源才能多且優質。

不過，他笑說，擁有先進的教育體系和學術體系，五間大學近年穩居QS世界大學百強院校，但擁有優秀的國際排名並不是就等於國際化，必須要走出去宣傳。

學習留學大國教育產業化經驗

鄧飛認為，外國經驗可適用於香港，他指出，若要構建國際教育樞紐，就應發展非公帑資助的對外教育服務產業化，補充人手之餘還可以通過收生賺取學費，同時帶動其他行業發展，相信整體經濟效益十分樂觀。他舉例說，美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等都是留學大國，去年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（Hepi）發布的《國際留學生對英國經濟的影響》報告顯示，27萬名大學留學生在2018至2019年間，為英國帶去259億元英鎊的淨經濟收益，而其提供的留學

服務成本僅29億元英鎊。

他繼續說，過往特區政府對“教育產業化”的討論同樣不罕見，而且態度反覆。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《施政報告》將教育歸為“六大優勢產業”，認為該等產業對香港經濟發展起着關鍵作用，並會推動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。2012年，立法會辯論“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”議案，提出議案的新民黨葉劉淑儀認為教育產業化出現大學商業化，導致超額收生、設施不足、資歷認受成疑等問題，令教育質素下跌。2013年，時任特首梁振英首份《施政報告》質疑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，並決定叫停該政策。

他認為，參考留學大國的教育對外產業化經驗，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發展建立在高度市場化的基礎上，即政府減少資助，通過大學機構與自身不斷優化，提升知名度、辦學質素和服務品質來爭奪生源。反觀香港，最多非本地生入讀的八大院校，儘管有學費、投資、捐款等收入方式，但依然依賴政府撥款。例如，香港大學2020-2021年度收支中，政府輔助撥款佔總收入的43%。香港教育開支常年增加，增速遠超政府收入速度，成為財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可見教育產業化仍遙不可及，強調政府需要正視，國外院校高度市場化的經驗是適用於香港。

訂立一套全面的戰略發展藍圖

記者問若設立北都教育城，如何保證大學辦學的質素？政府如何落實規範與監管呢？他說，政府若沒有針對性配套措施和長遠政策規劃，恐怕這次再提出“教育產業化”的結果也將與以前一樣淪為口號，難有突破性進展，所以政府一定要嚴格控制，才能成功。

香港到底需要什麼人才？他指出，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在2019年的推算，創科產業未來數年人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預計為4.3%，預計創科產業將成為香港各主要行業及新興產業中，人力需求增長最快的行業。他建議，若要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，培養多元人才，堵上本地人才缺口，應先把握主要意向人群感興趣的新專業、新就業的發展趨勢。



掃碼聆聽原文



掃碼閱讀原文